

MAR 24 1948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請勿誤考

行政院新聞局編譯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日

新 20 號

匈牙利政變內幕

此文共計三篇連載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及九月六日星期六晚郵報，為匈牙利前總理弗倫克納奇 (FERENC NAGY) 口述，該報華文譯編輯皮萊萊·史密斯 (BEVERLY SMITH) 筆錄。

上

在九個月之中，我看到的我的國家，被國內少數的共產黨所征服了。支持者是在這種任務方面受到蘇聯特別訓練和指導的七位人物。這次的攫取政權，是在合法的假面具之下完成的。它隨時有俄國佔領軍做它的後盾，同時，臨到最後的階段，它以強烈的私刑拷打和秘密逮捕來進行它的工作。但是，一談說來，波羅士外表的形式是保持的。甚至到現在，布達佩斯的政體，表面上還採取議會政治的步驟。不過現在留在政府內的那些「愛國之士」，已不再是自由的公民了；他們的言行，受到了可怕而看不見的各种壓力的威脅，匈牙利已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的國家。匈牙利的有關政治和經濟的重大問題，都在共產黨和蘇聯的共同控制之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匈牙利舉行了一次真正自由的選舉。這是東南歐蘇聯所佔領的國家中僅有的一次自由選舉。我的小地主黨主要以農民、白領階級、和小商人、所組成，在選舉中得到了57%的票數，這不但是個普通的多數而昆了位

何其他黨派的票數，多出三倍以上。

因為要使政府按照雅爾達協定，根據廣大代表所有民主分子的原則，我們成立了一個聯合政府（包括獲得選票百分之六度克在內）。選舉後我做了三個月的副會議長，此後，做了六個月的匈牙利內閣總理。

我們在開始時抱着甚大的希望。我們相信雅爾達的保證，而這次的自由選舉，就是一個良好的預兆。我們期待着「種木來，在這個木末中，匈牙利在強大的東部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可能做一座友誼和貿易的橋樑。

至於我們的社會和政治的組織，匈牙利人多半歡迎並主張個人自由和西方民主代議政治的形式。在那些日子裡，俄人一再給我們保證，就是他們並沒有強迫我們接受他們政治的形式，或干涉我們和西方國家間友誼關係的願望。

政府和匈牙利的人民，因為這種種希望而感到興奮，開始以激發的精神，在一個曾經被德軍隊死力鬥爭而有系統地被徹底破壞的地方，來規復戰後的廢墟。匈牙利人是聰敏而勤懇的。他們喜歡業已完成的合乎遠去的改革。當前的處境是艱苦萬分，並且賠償的負擔重大，但是，假使我們努力工作到相當程度，那末，看來是光明的。匈牙利在這種精神之下，完成了重建的各項奇蹟——在重建的早期中，讓我這樣承認，共產黨也負了很大的責任。

工作，有生氣地進行。新的住宅和建築，從新磚瓦間興起。通貨膨脹被克服了。一九四六年的收穫，解除了饑饉的危機。一九四六年九月的某日，五十萬的人民，從匈牙利各地趕到布達佩斯，來頌揚共和國小地主的領導。（他們在俄國的將領之前，帶着敬愛而也是不謹慎的熱忱，每逢提及美國，就歡呼起來。甚至在那個時候，共產黨勢力的侵入，已超過了一般人的想像。

在那個時候起，它進行得更快了。再過九個月，共產黨人接管了政權。(3)

一個少數黨怎樣能夠做這件事情呢？他們怎樣能夠這樣地滲透和深入到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使他們和他們的俄國主人能夠掌握絕對的治權呢？用什麼壓力、機謀、技巧和策略，把多數小地主的幾個最有力量的領袖監禁、放逐或籠罩於恐怖的氛围中呢？經過了「連串的事態演變，匈牙利總理的戒，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怎樣會發現自己「在一個瑞士邊境的小村落中呢？並且僅以辭職才換得我五歲的孩不拉古洛 (Rajk) 的歸來，同時，受到一種離奇的控訴，說我對於我自己領導的政府和我在最近所助成建立的共和國，圖謀不規呢？

這些問題，是我希望在這裡回答的。我願意讓美國的人民和仍享有自由的各地人民，明白匈牙利共產黨在我親眼目睹中所進行的滲入方式。

為使敘述清晰起見，我必須先告訴你們一點關於我祖國的情形，因為利用當地政治環境的每一個特點，是共產黨的策略；我也必須告訴你們一點關於在戰爭期間匈牙利奪取匈牙利政權的事實，在這件事情中，不但有很多的策略，預示着共產黨後來所採用的方法，並且，它留下了共產黨能夠加以利用的某些情勢。

既然小地主竟成為共產黨所必須摧毀和顛覆的多數黨商略地敘述一下它的組織和領導方法，也是需要的。但是，以一個在美國得到謫情和聲譽的逃亡者的我，也許先得告訴你們一點關於我個人的和政治的背景，這可能有助於衡量我的陳述；可以使你們明白這個在匈牙利政府中佔有要位而因此成為共產黨集中攻擊對象的人的輪廓。也可以使你們能夠判斷共產黨的破壞名譽運動，他們在我離開了匈牙利以後，就立刻開始毀辱，誣我是一個陰謀家，乘機沒利者，和賣國者。

我承認很多的錯誤，但上面的這些指責則不在其內。我主要的錯誤是，在開始時，我為了急迫的理由，竟相信了在聯合政府中與共產黨同情者合作的可能。殊不知你決不能和共產主義妥協，我就是活着的見證。

當時的背景和環境，且請讓我慢慢道來，因為如果不由那些背景，我相信，共產黨所玩的把戲，是不會很生動的顯現出來的。

我於一九〇三年在皮司(Dixon)地方出生，那是一個僅有六百個居民的小村落，處於匈牙利南部的山地，在一塊介乎多瑙河和特格佛河(Tisza River)的地區中。我的父母是很貧苦的農民，有十五畝田和許多債務是他們的擔子。他們把我放在最艱難的環境下，媽有起來。

我的祖先住在皮司已有好幾代了，從村裏的長老會在一七五九年開始登記戶籍以來，直到現在。在這整個時期中，所有我的家屬，都是馬札兒人，長老會教友和農人，連社會地位稍為高一點的鐵匠，也沒有。

長老會在匈牙利，已有悠久的歷史，在信徒的數量方面，僅次於天主教。我從小就接近教會，因此，我能夠在美國，參與長老會的禮拜，對於我回我的家屬，確是一種安慰。

我的父親和母親，並肩地在田裡工作。因為我們的田地還不能維持我們的生活，所以他們也到鄰近有錢的地去那裡去當雇工。

當一八四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我還不足十一歲，我的父親被徵入伍。我變為一家之主。我必須學習怎樣耕田，怎樣割豬，怎樣支草，怎樣處理山坡上的蘆葦，和怎樣照料葡萄園。除了美國以外，世界各地的人民很少把去蜀黍連輪兒在煤火上烤過或煮過來吃的，匈牙利倒也是其中的一個。在星期日的下午，我的母親烤數塊玉米，實是一種特別的款待。

我每天到村上只有八個教堂的長老會與學校上課，一直到午刻。下午，我同母親一起工作。那時根本沒有什麼時間讀書，但是我的

母親決要我受教育。假使她聽到學校教師、牧師、或磨坊主人那樣，她可以借本有趣的書來，她會是上達至三個村落以外的地方。她這樣就能讀她愛好的書本，且心情傳給我。晚上我在煤油燈下看書，吃飯的時候看書，甚至在耕田的時候，我也想法不著書。當雨下得火火而無法去田中工作的時候，那是最好的閱讀時間。

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什麼東西都讀。我知道美國的第一件事，是我讀到本關於林肯和杰將軍 (General J. E.) 以及南北戰爭的書。但是使我得到印象最深的是關於一八四八年的民族英雄蓋塞斯 (Jesse Hazzell) 的那本書，他為了匈牙利的獨立和改革農民的處境曾與勢力奮鬥。在一八五二年，那時，蓋塞斯流亡在外，他被一隻美國的軍艦帶到美國，並且在華盛頓得到參眾兩院的正式歡迎，據我所聽到的，自從萊斐德 (Lefferts) 以來，他是受到這種崇敬的第一個人。

我的母親常常得意地告訴我，當古塞斯死亡的消息傳到我們的村莊時，她的父親怎樣跑到打鐘人那裡，向他為什麼不打鐘，以表示對於這個英雄的敬意。那個打鐘人，也許因為怕得非保守的地去，拒絕了。我的外祖父把他打一頓，奪到了這根鐘繩，於是，自那天開始，一直到古塞斯下葬的消息到達為止，他每天繼續不倦的打着鐘。

我在十二歲以後，因為經濟窮困，已使我無法繼續升學，但是，在我的母親鼓勵之下，我盡力繼續閱讀。我從勇敢的鄉下母親的精神和識見方面，得到了很多的好處，她在二九四五年蘇軍佔領下的冰平時候，不幸在一輛蘇軍的坦克車下慘死。

這件事情怎樣發生，我將在以後敘述，但是，我們在這裡只做公平地說，這顯然不是共產黨計劃的一部分，而是無知的俄國軍人所表現的一種個人的愚蠢殘酷行為。

我的父親送第一次火戰中平安歸來，我們三人一同努力工作，未

償付我們的若干債務。

在一九一九年戰爭後的混亂中，貝拉甘 (Bela Kun) 領導下的共產黨推翻了布達佩斯的政府，成立了一個幾個月生命的政體。那是革命建立的政體——一種恐怖和流血的統治。使匈牙利的共產黨在此後的二十五年中被認為非法。貝拉甘逃往俄國，據報告所傳，他後來在那裡因為不滿於黨的方向而失蹤了。

在那次短短的布爾希維克革命中，我們的村落，只受到了輕微的影響。除掉了共產黨是反宗教的而因此我們反對它以外，我們對於共產黨，可說沒有什麼認識。但是有些爭後的影響，對我國條頗大。自從共產主義被禁止以後，許多匈牙利的共產黨人就到莫斯科去了，他們在那裡，在共產國際的政治思想和戰術方面，受到了幾年加緊的訓練。他們後來同俄國軍隊一起回來。

賴柯雪 (Mattiia Rahai) 是這些匈牙利共產黨裏的一個。緊記着這個名字。在一九一九年事變之後，他因為和（連串的謀殺案伴有圖，被禁在布達佩斯的牢獄裏。俄國人對於他一定非常重視，因為他們願意把許多匈牙利軍官——我保——和有些重要的匈牙利國家的珍貴紀念物品，來交換賴柯雪。這個交換的談判是成功了，於是賴柯雪到俄國，而受到適當的訓練。後來，他是許多歐洲國家內的一個顧問特務，忍受着好多艱苦和禁閉。同其他的人們一樣，當時被成熟的時候，他回到匈牙利。我對於他知道得很清楚，這位肥矮、禿頂精明，有時很有趣而老是可畏的人物——他在我的聯合內圖中，是共產黨副總理。

因為賴柯雪的禿頂的奇怪形狀，人們在咖啡室中竊竊私語時，稱他起了一個「洋芋頭」的綽號。但是這個名稱，絕對不帶侮辱意義而的敏銳的頭腦。在一九三三年，他因為死於戰爭的二十九個軍人（在兒的六百個公墓的（九個）的紀念碑行揭幕禮。那時是三十二歲的我，被推代表村不裏的青年人致詞，在我講完以後，從州府貝克蘭 (Pasc)

趕來的新聞記者，跑來向我，為什麼不試為新聞稿作。

這種提示，使我感到吃驚而高興，於是我們始用我的鉛筆寫作。

這一年，是我最早運的二年。我和一個同村的農家女拜洛格 (P. L. Logg) 結婚。經過了二十四年苦的生活，証明了她是我良好的伴侶。

她同我們的三個孩子，現在和我一起在美國——感謝上帝。

我用鉛筆寫作，我的妻不以娟秀的筆跡替我抄寫。我所寫的是我知道得最清楚的那件事：在一個被巨大的男爵與地所支配的國家內，農民們的問題和痛苦。這些寫作，使我在州內得到了「點小小的聲名」，因此，我被選加入那時擁護政府的農民黨。

當我在二十五歲的時候，我替布達佩斯的一家報紙，寫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論匈牙利不能讓帝制恢復的事。這篇文章，使我從國內各地得到了二十封以上的信和許多電報。在匈牙利，這是被認為一種非常的新思想。

在一九一九年，這裏的不景氣，早在匈牙利開始。農產物的跌價，使生活最感困難的農民，幾乎無法忍受。一個農民的集會在貝克司舉行，我被選去講話。我迫切的說，假使在十天之內，政府對於農產物的價值，沒有行動，農民們應當反對政府。

結果政府竟沒有動作。於是我同許多和我一樣主張的人，離開了保守性的農民黨，到次年，我們已組織了小規模的小地主義，這是命名了最後變成匈牙利的多數黨的。在創辦人和領袖中間，繼續推進克務直到戰後時期的那些人，是鐵爾迪 (Gyula Gömbösi) 和瓦爾加 (Bela Varga) 柯凡克斯 (Bela Kovács) 和我。

後來任匈牙利總統的鐵爾迪，在那時是一個長老會的牧師，一個比我老得多的人。他是一個有與不同有節操和可尊敬的大主教教士，他後來做匈牙利國會的議長。(照最近的記述，他已逃脫了共產黨的魔手而逃往於西歐的一個修道院中) 最後是柯凡克斯，一個高入出狀的年輕農人，文雅而熱情，慷慨而勇敢。(最後得到他

的消息，是他被禁閉在俄國秘密警察的可怕的地牢內，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是否仍在人間，就不知道了。他是我十年的朋友，雖則我們的信仰不同，我們是彼此的敬愛的。

在小地主克剛成立的那比較單純的日不裏，我們的領袖也含着三個要點：一、全國的不記名投票（不記名投票早實行於各城市）；二、土地改革，把大地度分成小塊，其目的，一方面在使地分給農人，他方在打破大地主們在政治上的那種近乎封建式的把持。三、給予農民以早為城市工人所享受的各種社會福利。

這裡沒有篇篇歸來敘述匈牙利在九三〇年向的複雜的政治情形。這個國家主要是被地主和富人所控制。有些地方，它有寡頭政治，以道政治，和封建主義的特徵。但是它也有個不大高明的議會政體和（此民主的權利，如在城市裏的）一種不記名投票；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等（除掉被認為非濟的共產黨）。

對於小地主克，這是一種吃力的工作，但是我們獲得進步，並選出了很多的議員。我繼續在我們的小農場上工作，一直到一九三二年為止。那年，當我是二十九歲的時候，我遷往布達佩斯，從事寫作來維持我的家庭，同時，利用其餘的時間，旅行國內各地，替小地主克做些宣傳的工作。黨的力量逐漸薄弱，無法給我一份薪水，但是他們替我負擔了一部分的旅費。

在一九三〇年內，我親自訪問了匈牙利的二千多個鄉村。我儘量搭火車旅行，但是在鄉下地方，我多半搭乘農民的載草車或者步行。在那些年歲裏，同我碰頭和談話的人，可以說有好幾萬，我的記憶力很好。這次旅行，使我知道了我國的人民，這種認識不但對我個人是極寶貴的，而且自然也有其政治上的價值。我參與在民意測驗來徵集全國的民意。

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的選舉中，我是被選入國會的小地地主克員裏的一個。三個月後，希特勒和史達林簽訂協定，侵入波蘭，而開始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個九百萬人口的小國匈牙利，沒有軍事上的準備，只求置身事外，這件事情，在開始的時候，似乎是可能的。

但是，在希特勒的凶殘，於一九四〇年燒過了斯干的那堆瓦，法蘭西、荷蘭和比利時以後，對於我們的壓力，日漸加重。當時整個的歐洲都聽命於德國意大利，和它們那時的夥伴蘇聯。一九四〇年秋季，匈牙利簽字贊助三國同盟來設法討好希特勒的時候，只有小地產克散投票反對。

到一九四〇年的春季，德國控制了匈牙利，有許多地方，同樣來俄國控制匈牙利相似。在商務上，匈牙利早就和德國有密切的聯繫。當時，德國用威逼的手段，接收歐洲戰敗國家在匈牙利的各項事業，來加強這種把持。（這對於後來俄國的政策是有幫助的）。德國的技術人員，被安置在重要的各工業機構和鐵路方面。秘密警察遍於各地。人民同盟（The Volksbund）向恩籍德國的匈牙利人呼籲合作。匈牙利的納粹黨，用大量的金錢和宣傳來補充人員。

就是這些匈牙利的納粹黨員，現在有幾萬人，變做了匈牙利的共產黨員，他們拿着他們從前奉行希特勒克爾的同樣的絕對服從心，來奉行史達林的黨綱。

納粹黨人在匈牙利的上層階級中，也找到了許多同志，這些人或者早同德國發生了很深的財政上的關係，或者他們看到希特勒是未來統治者。一九四一年九月，內閣總理戴理基伯爵（Count Teleki），一位可敬的人物，因為看到我們受到的逼迫趨向戰爭，而自殺了。到奧季政府把我們捲入希特勒對蘇的戰爭，把成千成萬沒有好好訓練和配備的匈牙利人撤去送死。

大多數的匈牙利人，特別是農民，從開始就反對戰爭，憎恨和德國聯繫，並且，甚至在那時，就認為同盟國家，將獲得最後的勝利。也許在人們看來，這是我國人的事後臆測，因此，我願意引証兩個美國記者所說的話。斐斯（Shiranee Bass）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異

期六晚郵國報內寫道：我在一九四一年，親自看到大多數的匈牙利人憎恨並懼怕他們自己國內的納粹黨員和德人。他們渴望避免被在德國的方面，被牽入戰爭。

一九四三年八月三日約翰·根室(John Gunther)自伊斯坦堡(Istanbul)發給紐約時代的電訊說：匈牙利的士兵，非常親近同盟國家，而特別親美。

自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我組織了匈牙利農民聯盟(Peasant Alliance)，這個組織的目的之一是抵抗納粹黨力的擴張。小地主是向反對戰爭的，慢慢地，它的會議，變做了秘密的地下會議。在一九四二年，我們和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開始了一個不聲不響的皮納粹合作。在一九四三年，小地主竟向政府提出一個條約，要求匈牙利退出戰爭，阻止納粹分子虐待捕人，並肅清軍隊裏面的納粹軍官。這個條約被秘密地運送到瑞士，在一家報紙上發表，而傳動了當時的輿論。

雖然我的皮納粹的思想為人所知道，但我的議員身份，使我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一直免於逮捕，後來，德軍佔領了匈牙利，加緊了他們的控制，並且，把所有來不及逃到森林裏去的民主領袖，禁閉起來。他們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把我捉住。在那天，我在藏匿的地方，聽到納粹黨徒已經在皮納找到了我的家屬，並且，假使我不自首的話，就要把他們禁閉起來。於是找到貝克爾的秘書麥瑟那部去投案。我的罪行是這樣的：自始至終沒有經過訊問，即被打入獄中。

那監獄裡極其狹窄，且沒有供給伙食的辦法，所以，納粹黨徒就准許地向附近鄰近的一家旅館裏送來。一天，我喜出望外地看到，那個監獄在一個侍者白色衣服內而送食物的火個子，就是我的勇敢的朋友柯凡克斯。他可以替我帶信到家，也可以帶信給農民抵抗運動(Peasant Resistance Movement)，這個運動，在那時除了

藏匿食物和物資，不讓蝗蟲一樣的德人徵用之外，實在不能做什麼事情。

幾天之後，我被移到布達佩斯的一個監獄裏去，此後，就不能再向外傳遞消息了。這個監獄，包含着各色各樣的犯人，普通犯人，波蘭難民，愛地塞路橋工人，和被捕的英美飛行師。不知怎樣的，消息傳進來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我們在數小時之內，得知了英美軍隊在諾曼第登陸的驚人消息。當我在那獄中的時候，經歷了二十八次空襲，但是監獄沒有被命中。當英國的飛機飛過的時候，被保的英國飛行師唱美國的歌。當美國的事務飛機飛過的時候，被保的美國飛行師唱美國的歌。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國人感覺匈牙利政府的不安，仍然不敵，所以他們成立了一個組織完備的匈牙利的新政府。在這次暴動完成前的最後十分鐘，被領導政府的司法部長，簽署了一個釋放被禁閉的議員的命令。在這個命令還沒有被取消以前，我的朋友很快把我從監獄裏移出，藏匿到別處去，我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直躲到俄人攻陷布達佩斯時為止。最初，我隱藏在一個長者會的醫院裏；然後，在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六人家內；然後，在一個蘇格蘭傳道會裏面；那是一個教會信仰新教的猶太兒童而由長老會所維持的機構；以後，在一個造勢廠附近的朋友家裏。

到了一九四四年聖誕節時，前進的俄軍已進入布達佩斯，他們就用炮和射擊隊作逐屋的戰鬥，我所藏身的房子，一間房一間房，一堵牆一堵牆地爆炸，強和砲彈所破壞，一直等到只有留有一間小小的穿堂為止。我因為怕被射擊的同情者指認，所以蹲伏在這裏，不敢跑到下面的防空室去。一天，我得到警告，說是一個射擊隊要來了，我就趕快地跑進地下室。不到十分鐘以後，一個炸彈完全地這個小小的穿堂炸毀。當我回去的時候，我發現我以前讀的那本「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已破碎地埋埋在瓦礫堆裏。

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俄人在清除街道。我們在那個時候，倒高興

着見他們——他們替我們解除了納粹的暴力。再過幾天，我可以穿過斯瓦殘垣，到蘇格蘭傳道會去。在這所破壞不多而擠足了難的猶太人的建築物裏面（因為它是在瑞士公使館的保護之下），狄爾迪和我重新成立了小地克黨的總部。

沒有消息，而郵政、電話或電報也都陷於停頓。幾天以後，柯凡克斯忽然坐着汽車出現了。他告訴我，俄國人已在東去一百五十哩的狄勒里森（Dillersheim）地方，成立了「個臨時的匈牙利政府。它包含着各黨的人物——柯凡克斯本人是內政部長——但「羣爾生的說俄語的匈牙利人」似乎在幕後操縱計劃着一切的事。他說，我以一個具有實際政治經驗的小地克黨領袖的資格，最好和他一同回到狄勒里森去。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那天，在去狄勒里森的路程中，我看到了國內的一種可怕景象。我見到匈牙利的每個城市，每個鄉鎮，每個村落，每個十字街頭，都變成戰場。大多數的建築被破壞了；去年的收穫還擱着沒有打穀；橋樑、電報線、和鐵路被破壞了。我們看到兩倍於匈牙利的俄人——不但是路上就是田地和牧場上，各處都充滿了他們。因為，按照俄國軍隊的習慣，他們的生計，要由駐在地維持，所以，饑餓的徵兆，早在農民們裏顯現出來了。

狄勒里森的新政府，由米克魯斯將軍領導任內閣總理，裏面已攜着三個在戰爭結束時投向俄軍的將軍。這三位將軍的作風，和那著名的匈牙利倉庫炸彈唐古（Gungu）的一樣，它恰好是在匈牙利停止在鐘繩上。當鐘打下去的時候，唐古說，「是我打的鐘！」（這些軍人，一等到他們的目的達到以後，就退隱下來）。

在臨時政府裏面，有三個不顯著的共產黨。但是實權是在其他七個人的手中。雖則他們是匈牙利人，但是多數在俄國住得很久而講着俄語，其中有幾個人已取得俄國的公民資格，並且在蘇維埃政府內服務。但是，他們現在又宣布他們是純粹的匈牙利人，高

與回到祖國來，熱烈地愛護和效忠祖國的——甚至是民族主義的，
雖則在他們的政治思想上，自然是奉行共產主義的。

(13)

這就是七巨頭 (Big Seven)。他們現在所用的名字在他們出生
中，多數用過很多的名字：是：賴柯雪 (上面已提過)；蓋路 (Gardel
gird)；萬斯 (Jollan Mad)；賴奇克 (Jaagla Rajk)；柯夫
(Aleksan Kaban)；本冰 (Spaf Rein)；庫萊卡 (Muhaly
Stukas)。

你們以後會碰到他們：副總理賴柯雪；交通部長蓋路和最滿經
濟會議主任委員萬斯 (蓋路和萬斯，在蘇聯加強其對匈牙利的經
濟控制中，將是主要的人物)；統轄警察的內政部長賴奇克；和以
會聯合會主席柯夫。

臨時政府，實際上是毫無辦法，因為它和匈牙利其他各地無法
交通對各界人士也毫無聯繫。在那個時候共產黨憑藉了許多武裝的
交通工具和電訊器材，正忙著在全國各地組織革命會議，並且在
建立一個聽命於他們的全新的警察大隊。

當我在九四五年三月初回到布達佩斯，執行改組小地主黨的時候，
我有一天晚上，被大門外的汽車制動機的銳利聲所驚醒。一個俄國上
校緊張地衝進來。

「快來，他說：『你要到勃勒里森去起草十分給農民田地的法律。會議
已經開始——你必須到那裏，否則會議就要過去。趕快！』

「剋兒之後，我們已在路上了。這是我期望已久而化去我一生大部分
的時間所研究的——種改革，並且，匈牙利的自由分子，已夢想它有幾代了。
但是，我並沒有預料到這種情況：在黑暗裏和高低不平的路上，一個
俄國司機以不顧一切的速率駕車前進，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他已睡
去，而把我們向理事議會送去。

這次坐著汽車趕路，在某種意義上說，實在象徵著我以後數月
的生活。但是，在它那瘋狂和冷酷的性質下面，還隱藏著一種精心計
算和無情的蘇聯政策：這種政策當她要可怕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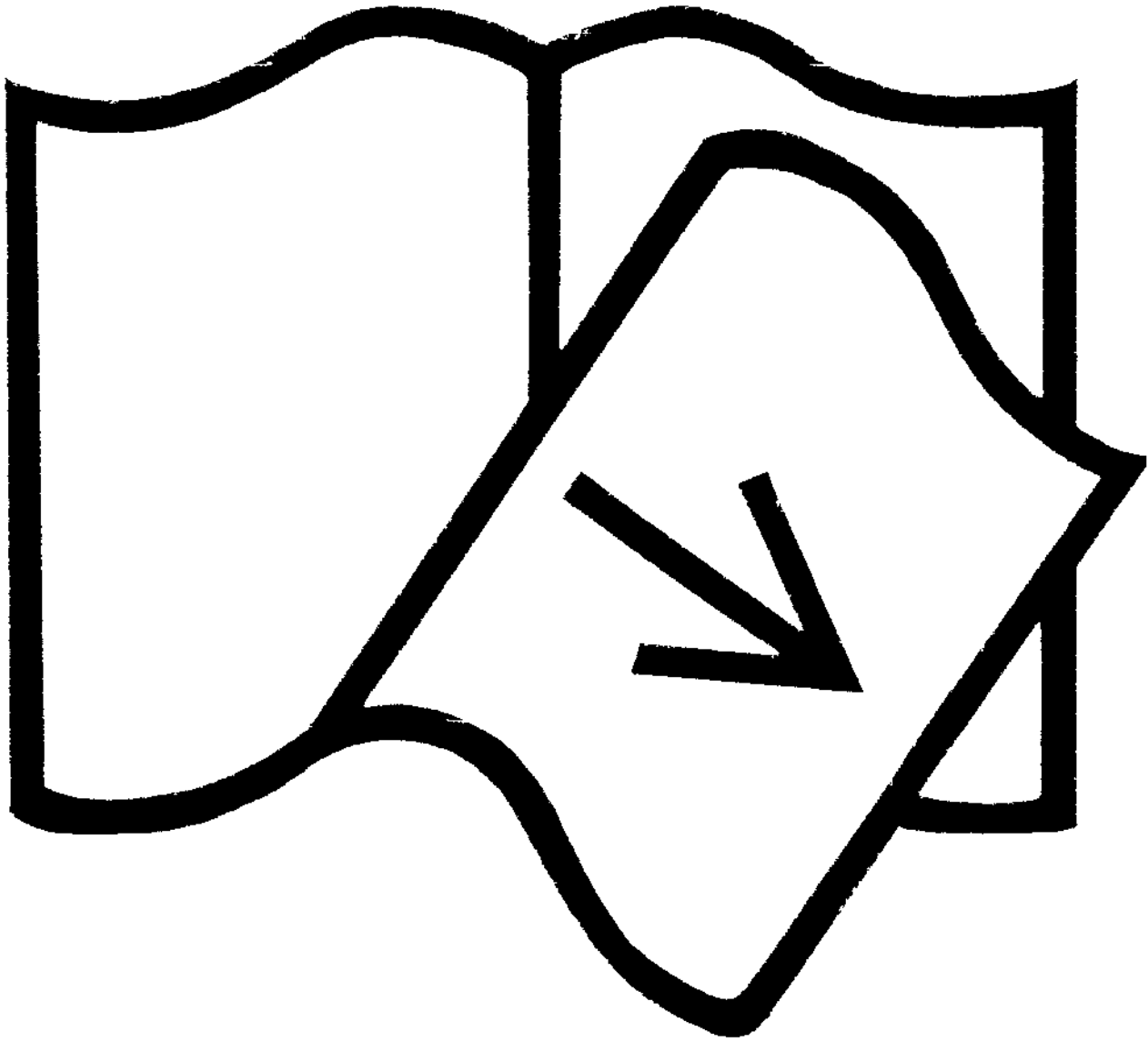


Figure P14

傾向極左，現在完全屈服在共產黨恐怖的支配之下。但是共產黨偏偏要把政變套上合法的外形，仍舊要我簽字辭職，那是我取回拉西嘉的武器。

大約正在這時候，國會議長范茄，小地主黨有力領袖的最後一人也從匈牙利逃出來了。也在三十一日猶打雷打電話給高爾登並且大肆吃穿要他打一個電報回國說我已經辭職，即使並非事實。

七月一日夜我從殷士布拉克處獲知我的兒子已在途中。內人和我立刻動身到瑞士邊境的布希村(Buchs)去。我們很感激：我的小女朱麗葉平安地在瑞士，我的長子小佛蘭克在華威頓，而我們現在正要得到拉西嘉了。

我的親愛的妻子雖飽經憂患，仍很強健堅決。當她一眼瞥見拉西嘉剛過邊境的時候，就暈厥了過去，並且人事不省者許久。幸而好心的瑞士邊防官吏救醒了她。我走上前去和名叫福羅里安的共產黨官吏會談，他就是把我孩子帶來的人。我問他為什麼不把卡波克司也帶來。他說他完全不知道帶卡波克司的那回事，他唯一的使命是在把我的兒子交給以前得到我的辭呈。我告訴他立刻打電話到布達佩斯。這一來化了很長的時間。最後回答來了：說不能照辦，說卡波克司是一個「危險的叛國者」。當時我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拉西嘉已經十分疲倦，並哭着要看看他的姐姐朱麗葉。於是我叫佛羅里安寫出關於卡波克司的正式回答並要他簽字。我也把我的書面辭職交給了他。至此我的妻和我熱烈地把拉西嘉抱在我們的懷裡。

此外，我們還收到一件東西。共產黨也許是出於無聊的幽默，也許是由於對史達林的禮物的盲目崇敬，居然以史達林一年前送給我的那輛俄國汽車——裡面有美國的零件——載了我的兒子歸來。我於是同我的妻子和拉西嘉跨進了那輛車子，在黃昏中向那親善的瑞士駛去。

拉西嘉興奮的向着美國。吉普車而嗚嗚唧唧。奧國的美國佔領區士兵似乎已經知道拉西嘉是來會他的父親的。當車停的時候，他們圍着他給他糖果和同情，並且在他們的佔領區裏一路上來着吉普車小心護送。瑞士人已經從報紙的照片上認識了我，他們到處把我們當貴賓接

侍在華倫斯苔德 (Wallenstadt) 小村一位客棧主人跑出來請我們住在他的客棧裏。

到那時共產黨的廣播像喇叭似的在喧鬧。說我不僅是一個叛國者，而且是一個逃犯和一個不法拐走了十萬元的竊賊。事實上我祇有旅費所剩餘的錢——僅夠維持一兩星期。我的其餘的財產都在匈牙利，一切家庭的所有物包括那個小農場在內，價值不到三十元。

當我們到達日內瓦和朱麗葉會面以後，我發現幾乎所有匈牙利駐在國外的外交官，凡不是共產黨員或者他們的家庭不受共產黨的壓迫的，都因為這次布達佩斯的政變而辭職了。這許多人中有一位是匈牙利駐美大使施德馬沙克 (A. László Széchy Magyar)。當今天成千的匈牙利共產黨員還是高呼希特勒萬歲的納粹黨員時，他正在達橋地方受苦。

高爾登公使也辭職了。他為我們安排美國之行，在日內瓦的一位好心的熟人把錢借給我們作旅費。我就把那輛史達林的車子留在瑞士採取行動了。鐵爾迪先生在名義上還是總統，但不久為特務所迫解散了國會，並下令舉行一次新選舉。在這次選舉中，小地主黨的候選人雖然也可以競選，但是祇有那些被共產黨所認可的候選人才行。

新的選舉規程使索亞領導下的權利自由黨 (Freedom Party) 完全無資格競選，甚至連社會民主黨裡較不激進的分子也受到打擊。假使各種結果都像共產黨所預期那樣完好，那末，俄國也許會批准對匈和約。

曾經竭力與共產黨合作的我，目睹了蘇聯侵入的演說又和暴露。東歐唯一經過自由選舉產生政府的匈牙利，無論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現在都已被置於蘇聯的掌中。我不知道挽救的辦法在那裡。我希望這個問題能提出於聯合國，匈牙利的慘局就是東歐所有國家慘局的典型，她的問題也就是今日全世界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的一部。

……完……